

温州城的早期筑城史及其原初形态初探

钟 翀^①

摘 要:本文从城市历史形态学中康泽恩学派的研究思路出发,以近现代温州古城的平面格局复原与早期筑城史考察为目的,尝试整合利用近代早期的大比例城市实测地图、明中叶以来的城市古地图、以及当地方志等文献中留存的与城市形态相关记录这三种资料,初步分析了中古以来温州城镇平面格局中的街道及街道系统、坊的集聚形态这两个主因素的变迁,并藉以评价东晋郭璞卜筑温州城的历史、推测现代温州城与秦汉东瓯王城的关系。

关键词:温州古城;筑城史;城市古旧地图;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

①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支持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41271154);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4JJD770024)。

在温州地方史与城市史地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现代温州城与秦汉东瓯王城、东晋郭璞卜地筑城的关系。关于这个悬案,笔者以为,一方面,仅仅依靠现存少量文献记录难以直接得出立论坚实的结果,尚需在资料的深入发掘上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应有所开拓。

在可资研究的各种资料中,除传统城市史地研究所常用的方志、古绘图、现代地形图之外,现存于各地的前近代以来所制大比例尺古旧城市地图这一类材料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所用的基础资料之一——温州城市地图史料,特指清末民国这一时期绘制的基于近代测绘技术的城市平面图、或是前近代以来(清康熙时期)受西洋制印技术影响而绘制的传统城市绘图。这类城市地图在精确度、地物表现的丰富程度上,都要大大超越此前出现在方志中的传统立面鸟瞰式古绘图,并且,由于测绘时间较早,此类地图可以提供传统城市在近代化转型之前的城郭都市原貌,因此对城市历史形态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而就分析的技术手段而言,近代以来西方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实践的一些成果颇具启发。例如,德国聚落

史地学先驱施吕特以城市实测平面图为主要分析资料,通过对城市形态中所谓“形态基因”的提取与考察,回溯城市形态变迁史,由此建立起西方城市史地的形态学派;正是在运用大比例尺城市古地图与中世纪以来丰富地籍记录的基础上,英国史地学者康泽恩提出了系统的城市历史形态分析方法,根据时空累积变化的形态比较,有效归纳了城镇平面格局动态变化中的诸种继承性现象,成功揭示了城市的发展历程。此类研究值得我国城市史地研究思考、汲取。^①

本文尝试利用上述城市地图资料,结合文献考察与现场勘查,对温州古城的历史形态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为探寻温州古城的早期发展脉络提供新的材料和理论依据。

一、关于温州的早期筑城史

在开展考察之前,先梳理一下关于东瓯与温州古史的基本历史记载。

瓯地的历史从文献上看始于周代,现存信史之载“瓯”者,当以《逸周书》最早。该书《王会解》篇中提到“东越海蛤。瓯人蟬蛇,蟬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鼈。

① M. R. G. Conzen,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of Town-Plan Analysi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ublication 27. London: George Philip, 1960. 中文译本参见宋峰等译《城镇平面格局分析: 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皆西向。”^①这里描述了周成王会见各方部族、接受他们贡纳特产的盛大典礼,其年代在距今约 3000 年前的周成王元年(BC1018)。^②根据这一段文字的排列顺序(东越→瓯→姑妹→……→会稽),可以确认这里的“瓯人”,应当是地处接近周王朝的东南百越区域的北缘地带(而非秦汉时期在岭南的“西瓯”)。再结合《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瓯居海中,闽在海中”这样的记载以及秦汉以降有关东瓯国的记述来看,《逸周书》所云“瓯人”跟后世的“东瓯”、乃至“永嘉”、“温州”的大线是可以明确的,关于这一点,黄展岳、林华东等已经作过严谨的考证梳理,在此不再赘述。^③

东瓯至迟到西周时期已经形成独立的酋邦甚或原始古国,至汉代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后,该地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正式设郡,而在此后将近 17 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温州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行政单元长期存在,直至今日。不过,从现有文献中可追溯的历史来看,该地的中心城郭都市却要晚到六朝时期才出现。在温州筑城的历史上,第一件值得关注的就是关于东晋郭璞卜筑温州城的事件,

有关此事,在现存温州最早的方志——弘治《温州府志》(以下简称“弘治志”)中有多处记载,而其中又以卷一《城池》(括弧内为原文夹注)的记载最为详细:

晋明帝太宁癸未始建。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取土称之,江北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今名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故名斗城(内则联络海坛、华盖、积谷、松台、郭公山如斗魁,而华盖锁斗口;外则接凑巽吉、黄土、仁王、灵官入斗柄,而灵官又为辅星,以象天之北斗)。时有白鹿衔花之瑞,又号曰白鹿城(仰忻诗云“世传初造郡,白鹿见林丘”)。凿井二十八以象列宿。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宋、齐、梁、陈、隋、唐因之。后梁开平初,钱氏增筑内外城,旁通壕塹。宋徽宗宣和间,方腊寇城,教授刘士英拒却之,因加筑,高三寻有奇,广一丈五尺,面损三之一,贼再至,见之失色。相持月余遁去。自后累经修筑。元禁城郭毋得擅修。国初城既归附,洪武十七年甲子,指挥王铭增筑,至今累加修葺云。

- ① 黄怀信等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会校集释》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890—903 页。
- ②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编《夏商周年表》,刊《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年,第 86—88 页。
- ③ 黄展岳《东瓯故都所在地研究》、林华东《东瓯国都地望初探》,刊《瓯文化论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53—171 页。

这段文字经常为郭璞卜城说的拥护者作为最重要的基本依据,不过笔者以为,按史料性质这段文字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可以五代吴越增筑为限,区分出较为可信的如钱氏筑城、刘教授加筑城池却敌、元代禁修城池、明初王指挥增筑城池这样一些比较具体、且距离该文献的成书年代较近的一些事件。^①其次,文中由近及远的追溯记载,其中不乏可信的部分,如山川形势、城中井巷沟渠的布局等,因较少发生变动,故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近年来温州的城市考古也可作为印证。^②至于有关东晋郭璞量土选址、以及白鹿衔花之瑞的记载,虽然其记载的来源可以上溯南宋时期,但笔者以为仍应归入传说之类。^③关于这一点,近年来温州当地学者争论十分激烈,笔者赞同侯百朋的质疑,即从该事的文献流传来看,南宋之前的正史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其所引六朝《永嘉郡记》等书均未见郭璞卜城之记载,而南宋以降《绍熙永嘉谱》(弘治志卷二所引)、《嘉定永宁编》(《方輿

胜览》卷九所引)以及同时代文人诗文之中大量出现与此事相关记载,反映此事系南宋以后的一种传说。该文还结合《晋书·郭璞传》记载的郭璞活动轨迹推断太宁元年(323)始建温州城之际他不可能出现在温州,其考证也较为合理。^④除此之外,笔者还可提供一个支持依据,即这一类郭璞卜地筑城的传说在宋以降方志中较为多见,下面试举两例。

如《淳熙三山志》卷四载“严高谓冶城狭小,不足聚众,将移向田渡,嫌非南向,乃图山川形势以咨郭璞,璞指越王山南小阜曰:是宜城。于是迁焉。”这一传说显然不可信——晋太康三年严高建福州子城时郭年仅年六岁。

又如《嘉泰吴兴志》卷二《子城》载:“《旧编》云:‘旧传晋郭璞欲移郡于东迁,每立标辄为飞鸟衔去,其女亦善地里,启璞无徙,因旧址损益之可以永无残破之虞,璞从之,其女今号迁城小娘子,从璞庙食。’《续图经》云:‘郡置于吴,而璞当晋惠怀之际避地东南,事不相类。’……况江南诸郡城多传郭璞

① 从弘治《温州府志》一书的史料来源上看,其成书之时可以见到的大概是《绍熙永嘉谱》之后的地方志书,这一点从该书的许多沿革、掌故等多处记述上也可以看出——即该书大抵详于南宋之后,而对此前记载则往往语焉不详。如之前的《祥符图经》仅引6条、《淳熙永嘉志》仅引1条(见于卷八《宦职·谢灵运》),推测系弘治修志之际转引绍熙之后方志或其他文献的结果。

② 根据初步调查,目前在海坦山、华盖山之间残存的东城垣基址,其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东晋(据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城址调查情况》之《温州市鹿城城址》);蔡钢铁等《温州发现唐五代北城门遗址》一文指出唐宋的朔门古城门,其位置与明清时的拱宸门、望江门相合(刊《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14日),这些实物都反映出在温州城的历史上,城址的稳定性这一面是不可忽略的。

③ 弘治志卷三可见“《绍熙旧谱》云:‘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说明郭璞卜城的传说在南宋已有传闻。

④ 参见侯百朋《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所迁,当亦有按图而定者矣。”这一段文字引用了北宋景德《吴兴统记》来介绍郭璞父女卜筑吴兴的故事,并引南宋绍兴《吴兴续图经》否定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更进一步提及“江南诸郡城多传郭璞所迁”,反映郭璞卜城的传说在宋代已经相当流行。

综上所述,从文献背景,东晋郭璞卜筑温州城的记载可以否定,那么,温州筑城的历史究竟始于何时?东晋的温州城和东瓯王城是否有关呢?就目前的资料留存情况,至少可以说缺乏直接的文献记录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在充分利用上述城市地图的条件,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从城市历史形态分析的角度来做一些探索筑城背景的基础工作。

二、温州城市古旧地图利用概览

上文说明温州城市地图史料在研究中的作用,专门提及两类城市古旧地图的价值,即清末民国时期绘制的近代实测系城市平面图、前近代以来受西洋制印技术影响所绘传统城市绘图。就温州地图的现存状况而言,前

者主要是指测绘于1923年至1944年的《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永嘉县城区统计地图》等实测城市平面图,后者则包括乾隆《县治图》(1765年刊乾隆《永嘉县志》所收)、《温州府城图》(1877年刊《瓯海关贸易报告》所收)、《城池坊巷图》(1882年刊光绪《永嘉县志》所收)等图,^①下面先介绍几种本文分析所用地图。

在上述地图之中,测绘于1923年的《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图1)是目前所知最早运用现代测绘技术测制的大比例尺温州城市地图,可能也是温州最早的城市实测地图^②。该图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科三期一连生樊颐于1923年5至7月间测绘,其比例尺为1:5000,详细展现1920年代温州城的整体格局与具体地物,地图测绘准确、规范,图例多达30种。此图出版后翻印流传不止一种,浙江图书馆所藏1924年刊《永嘉县城区全图》、温州市规划局网上公开《永嘉城厢街巷河道实测图》等图,均与此图相近;而此后民国时期出版的数种温州城市地图,也大多以此图为本制作。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城市地图中,运用于军事或警察方面的

① 有关本文所涉数种温州城市地图的地图形态、收藏地等具体情况,详钟翀编《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②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民国初年浙江省即行着手全省的地形图测绘,如杭州的大比例地形测绘完成于1914年,而温州最早开展大比例地形测绘的详情尚待考究,若就现存的温州近现代实测图而言,其5万分之1地形图测绘的实施当在民国十年、十一年间(1921—1922)。《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施测于1923年5至7月间,从时间上来推测,应该是在上述覆盖温州全域范围5万分之1地形实测完成之后对重点城市实施的大比例尺基础测绘作业,这与民国时期通常的地形图测绘进度安排也是相一致的。

地图在地物表现上要求最高,因此测绘质量也普遍较高。这枚《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年代早,濠郭、河道、街巷等温州城市近代化之前的古城要素保留较为完整,且比例尺较大,因此十分有利于复原分析的开展。

本文所关注的另一种实测图是《永嘉县城区统计地图》,该图系永嘉县政府统计室所编,由高声出版社在1944年发行,比例尺8000分之1。此图是民国后期在温州最为流行的一种城市地图,图上街巷系统的绘制极为详细。考虑到温州古城墙的拆除始于1917年,至1945年基本拆尽^①,以上两图大致反映了城墙拆除前后的城市面貌,因此可以这两种图为底图,并以现代的城市地形图作为校正,绘制上世纪前期的温州城市平面复原图(图2)。

而在前近代传统城市绘图方面,清乾隆《县治图》(图3)当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一种。该图系清乾隆三十年(1765)刊《永嘉县志》卷首所载。绘者取上南下北方位,表现了清乾隆中叶温州城市面貌,其城内街巷水道、衙署祠庙多以平面图或符号化形式加以描绘,详细与准确程度均大大超越此前的温州城市图,真实反映了前近代以来城市地图绘制的进步与康乾盛世时期温州城市的发展。从地图史的角度来评价,该图突破了此前温州城市绘图中仅具象征含义的简单表达,而以平面图的形式详细描绘了城中的各种地物,使其初步具备实际的商旅导览功能,因此可以说是一类具有先进绘图理念的新型城市地图。同时,从时间上横向比较乾嘉以来此种新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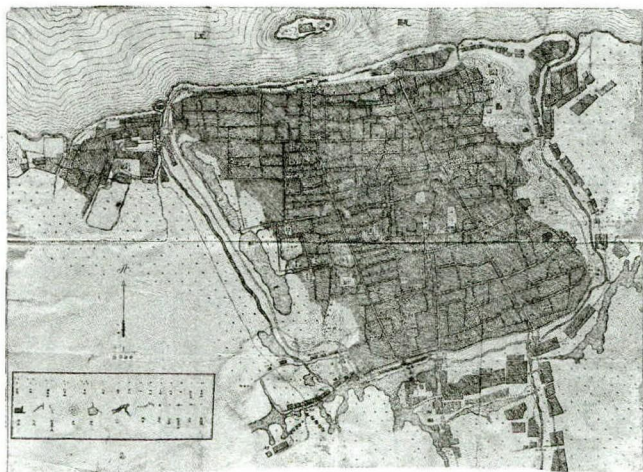


图1 《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1923年)

① 民国十六年(1927),拆除积谷山段城墙,建造中山公园,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旧城墙基本拆尽。见《温州市城市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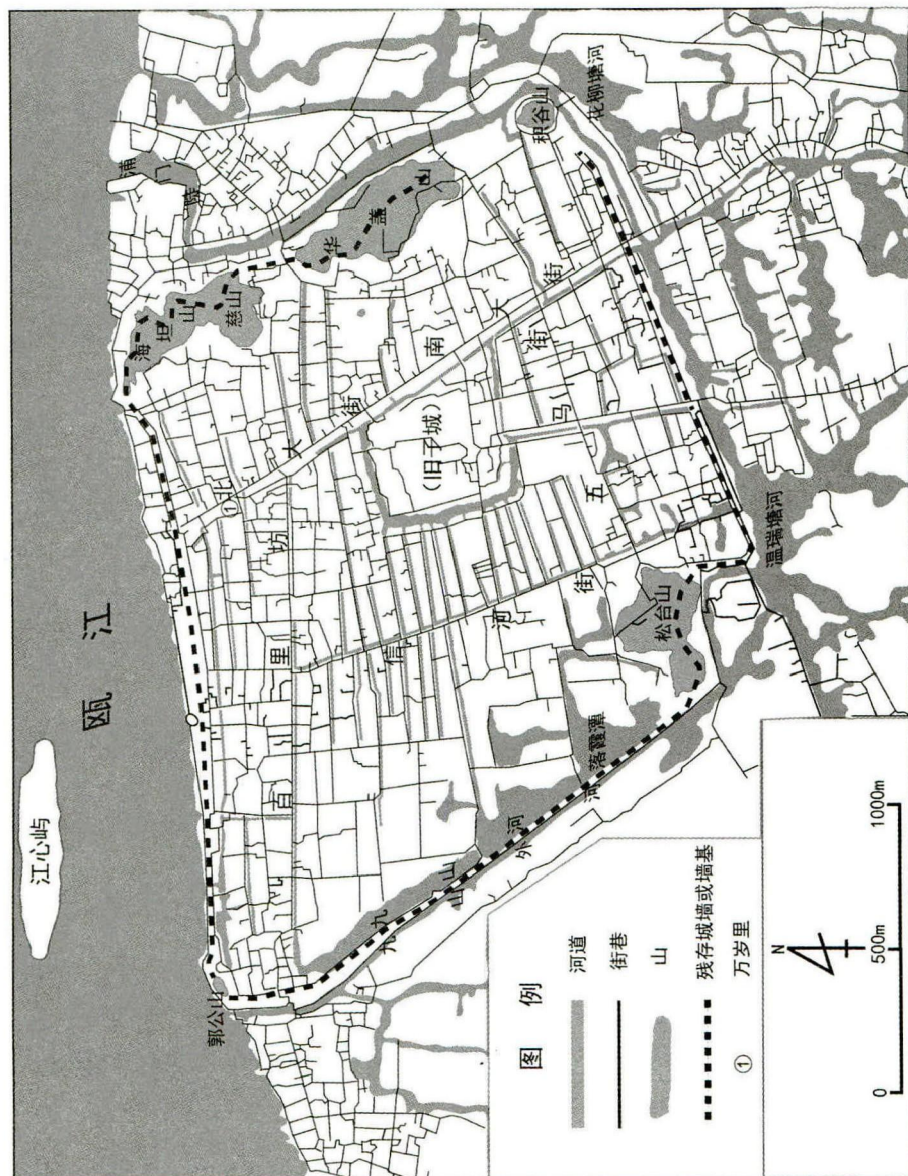


图2 温州古城复原图(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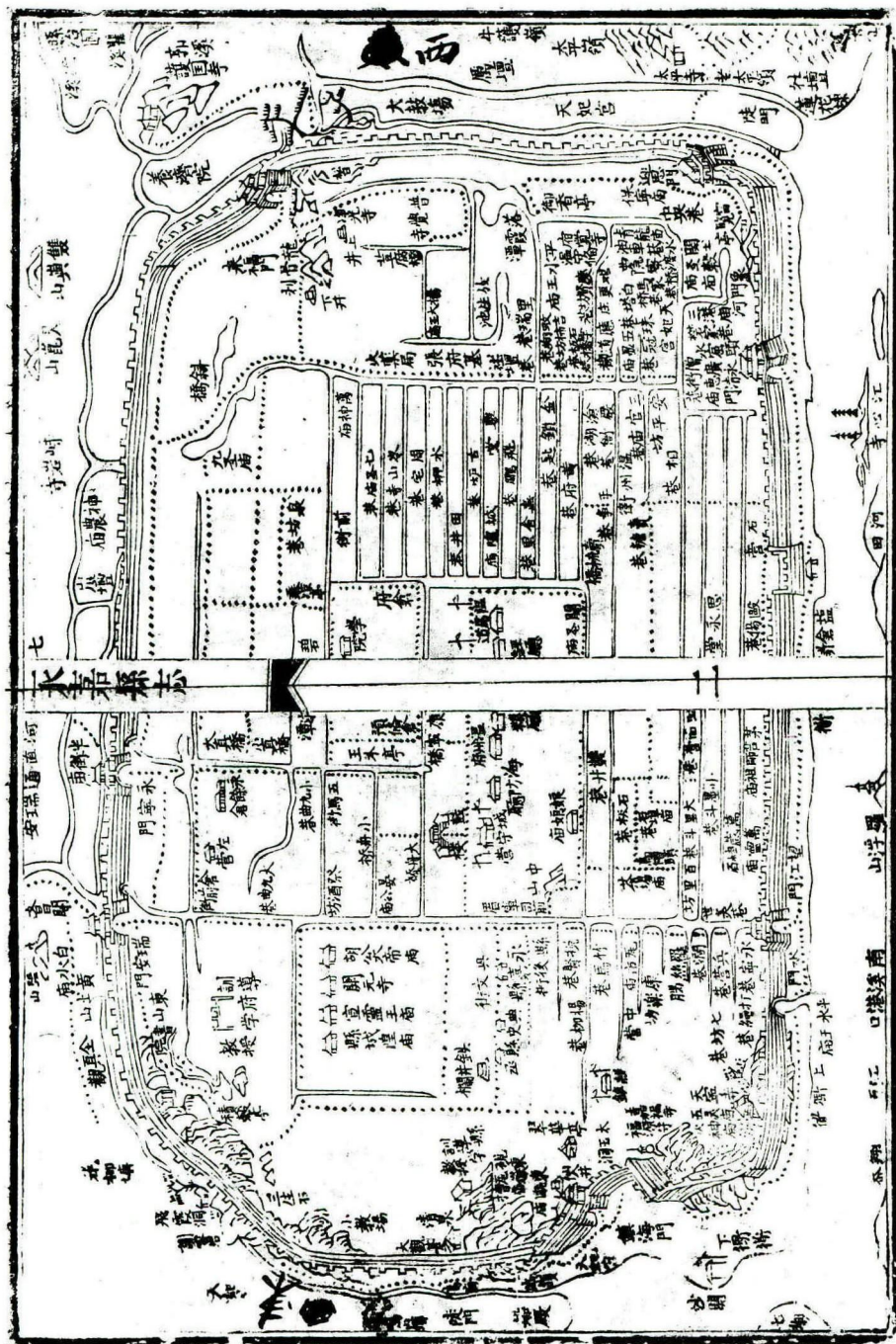


图3 清乾隆《县治图》(1765年)

地图在我国各城市的创制年代,可见温州的乾隆《县治图》的出现,要比上海的《县城图》(1814年刊)、南京的《江宁省城图》(1856年刊)、杭州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1859年绘)更早,而与苏州的《姑苏城图》(1783年刊)以及北京在乾嘉时期流行的《首善全图》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因此可为研究温州城市历史形态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下面将主要运用这3种图,并结合古绘图与文献记录,对温州城的形态格局进行分析。

三、温州古城平面格局的主因素分析

温州城自修筑以来,其城市规模

就被其围郭所限定,因此,有必要首先利用上述地图确认该城城郭的变化。

与近现代实测图相比,乾隆《县治图》虽有较大的变形,但根据图上所绘海坦、华盖、积谷、松台、郭公五山与城墙的关系,即可明确其城墙并无改变。关于清乾隆之前围郭的形态,还可利用现存温州城古绘图加以比较。

现存最早的温州城市古绘图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所刊《永嘉县志》,^①该书卷首载有《永嘉县治图》一种(图4),绘者采用上北下南的方位,以平、立面结合的传统画法表现构筑于五山之间的围郭与城门、城内重要的衙署祠庙与街道水系以及周边的山川形势。城中街道标注较详,描绘的水路多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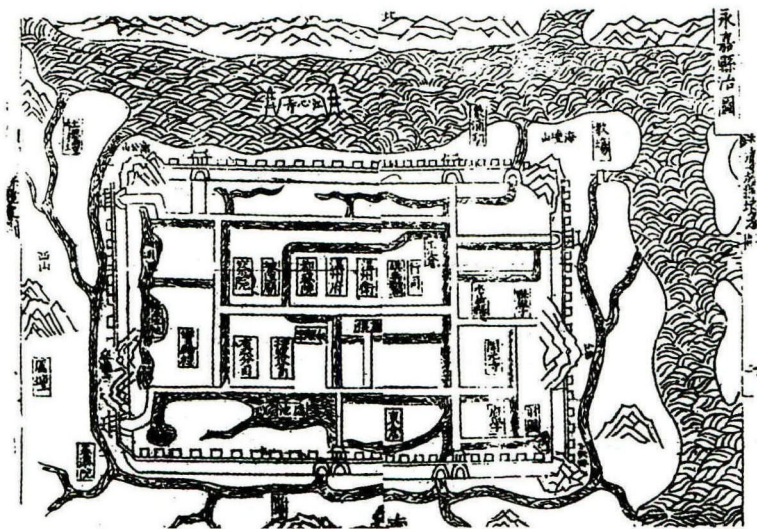


图4 嘉靖《永嘉县治图》(1566年)

① 现存古代绘画中,尚存数种表现温州城市的具有写实性质的古图,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元代宫廷界画大师、温州人王振鹏于至治三年(1323)所作《江山胜览图》水墨绢本手卷。该图系一48×950厘米的巨型长卷,图上反映元代后期浙东沿海的社会风貌,其中对永嘉城(温州城)内的店铺、街道及瓯江等都有具体生动的描绘,然该图未见地名标注,故应归为绘画一类。

世方志地图所缺载,如城南的雁池,城西河与放生池合为一体等^①,与弘治府志记载相符。因此,该图虽然绘制手法古朴稚拙,但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十六世纪中叶温州府城的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围郭形态而言,嘉靖《永嘉县治图》绘制较为粗疏,不过将之与乾隆图与民国复原图比较,仍可确认墙濠沿五山修筑,其走向与曲折变化亦与两图一致。如从城墙走向的细部来观察,像在民国复原图上看到的东城墙沿华盖山脊线修筑而出现随行就势的向内弯曲变化、以及城墙对郭公山与积谷山这两座小丘的内包、对海坦山与松台山这两座相对高大山体的沿外侧山麓修筑等表现,在嘉靖《永嘉县治图》上均可得到确认。再以城门与外濠的设置加以核对,至少可以确认温州古城自明中叶以来并无重大改变,这一结论跟弘治以来当地府县志的记载也是一致的。

除了通常的城郭规模比较之外,还要尝试运用康泽恩的方法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在康泽恩的研究中,街道及其在街道系统中的布局、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是反映城市历史形态演变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中街道系统作为城镇平面格局中最为保守的形态复合

体,往往显示出一座城市早期的时代特征;而在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方面,一些年代久远的布局类型,通常也往往更为接近城市中心所在。^②基于这样的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主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首先考察温州地图中街道与街道系统的演变状况。对比民国复原图(图2)与乾隆《县治图》(图3),可见两图在墙濠、街巷等要素的表现上相当一致,仅城内沟渠出现若干萎缩、退化,如城中北部的双井巷至百里坊一带的繁华地段等处,可见显著的河道分断或填埋,反映马路修筑等城市近代化之后填河工程的实际影响。

而就上述图2、图3所表现的街道系统来作比较,则可见到由南北向的“城内河”沿河南北大街(今解放街)、“新河”沿河的信河街,与东西向的百里坊、五马街构成两纵两横的干线路网已然成形,而其形成的历史则当更为久远。而民国复原图上见到的城西新河两边一河一街式平行排列的纬向街巷,构成了鱼骨状街巷网络构造,该构造在乾隆图上主要集中偏向新河东面,这一方面反映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城内西部的发展进展,另一方面,其纬向街巷的整体东倾现象也透露出清乾隆以前的城市中心当在旧子城周边、

① 详弘治志卷五《水利》记载。嘉靖《永嘉县治图》之后所刊温州府城图中雁池多未表现(或仅绘成河道),而城西河与放生池则有所区隔。

② 前揭康泽恩著、宋峰等译《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之第二章,第6页。

两大南北向干道之间的位置。

其次,就地块及其集聚形态的分析来说,由于我国文献中缺乏详细的地籍图资料,而能够替代的史料只有方志中有关“坊”的记载较为系统,考虑到明代之前的“坊”在地方都市中多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空间实体街区,因此笔者尝试以城中坊的分析作为替代指标来加以利用。

关于温州城中的坊的设置,最早可见南宋戴栩《浣川集》(四库本)卷五所收《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的记载:

《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绍圣间,杨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故抚其胜地则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是已,邇其善政则竹马、棠阴、问政、德政是已,挹其流风则康乐、五马、谢池、墨池是已,否则歆艳以儒英,掖导以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与夫扬名、袞庆、绣衣、昼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于防范俾家警,……独慨夫风霜之剥泐水火之荡毁百二十余年,而沈守枢更建如杨侯之旧,又五十年而焕章少卿史公实来其规,设益逾于沈矣,……总四十而仍旧称,以杨侯重

也,初杨侯既名其坊,又什以咏之,曰“三十六坊”。

这一段文字明确了两宋时期温州城内坊的变迁,而文中所指“三十六坊”在弘治志卷六《坊门》均有记载。这三十六坊大多密集分布于上述旧子城周边、两大南北向干道之间的地带,仅有容成坊与道爱坊、袞绣坊等少数几个坊分别向东延伸至华盖山脚、向西延伸至九山河。关于当地文献中“三十六坊”的记载还可从其他宋代史料中得以印证,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四库本)所见“温州永嘉县丰年坊右隅”、“温州永嘉县右厢新河北界棣华里”,《宝祐四年登科录》(四库本)所见“温州永嘉县在城梯云坊”均在这“三十六坊”之列(棣华里当即棣华坊),反映该城的整体形态框架的稳定可以追溯到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7)。①

此外,在温州龙湾国安寺千佛塔出土的北宋元祐八年(1093)蒋真祐等舍塔砖铭文中可见“右厢南郭西界五马坊”的记录②,该题刻的发现,不唯证明五马坊的存在早于绍圣“三十六坊”之建,亦可推断绍圣“三十六”是对之前所谓“坊五十有七”的继承与整合。

① 绍圣三十六坊中多数坊名作为街巷名称沿用至近代(如本文所示乾隆《县治图》、《永嘉县城卫戍区域略图》中均可见到不少坊名的留存),相关具体对应街巷的简要介绍,参见佚名作《温州:古城三十六坊话今昔》,刊《鹿城新闻网》2013年9月2日, http://zhejiang.kaiwind.com/whsysy/201309/02/t20130902_1071568.shtml。

② 详见方加松:《国安寺千佛塔落架报告》,《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弘治志卷六《坊门》之中,有15个坊的注释里提及它们源于南朝隋唐之时,如嘉会坊,下注“萧齐驯雉坊,俗名范统制巷”;又如瑞颖坊,下注“隋以西洋产嘉禾,故名”;又如棠阴坊,下注“唐宋泰坊,宋绍圣间以郡治故名”等等,不一而足。这15处唐之前的坊,可考者10处也都分布在上述旧子城周边、两大南北向干道附近,亦显示该地带形成聚落之悠久历史。

四、关于温州古城的原初形态

基于上节的分析,可以确代上溯中古的温州城的因袭关系,而就目前所掌握的北宋“三十六坊”之前的史料来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在记温州的华盖山、积谷山、东山之时均提及其与“子城”距离、方位。弘治志卷十五《古迹·旧子城》云:“在府城内,后梁开平初钱氏始筑。周三里五十步,通四门,内卫州治,外环以水。元至元十三年废为民居,止存谯楼门址。”联系笔者之前曾经考察五代吴越钱氏在江南多地修筑子城的历史,温州的子城筑于9到10世纪豪强并起的时代当作为信史^①。不过,若要进一步追溯该城的历史,则存在资料匮乏的困难。本文无意涉足温州古城是否即为东瓯国都的论争,仅从该城基本构型与吴

越早期王城的对比这个角度做一初步分析。

关于温州古城郭的构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观察。

首先,不规则的城墙修筑是我国东南地带古城建筑的一大特色,北起南京、镇江,南到广州、南宁,除了明代统一设计的卫所城池之外,大多有这样的特点。这一特点的来源,除因地制宜的筑城的经济要素之外,亦不可忽视东南区域原生文化的影响。

不过,如果拿温州城的墙濠轮廓跟相邻的吴越、闽越地带先史时期的古城作一比较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两者的显著区别:现今调查发掘的该地域先秦时期的古城,比较著名的如常州淹城、湖州下菰城等古城址,其墙濠呈环状的近圆形形状,而温州城的近方形样式,更接近苏州城(始建于BC514)、绍兴城(始建于BC490年)以及崇安闽越王城的形制,考虑到这三座古城均为王国国都级重镇,且苏州、绍兴两城是经过规划设计的,它们的出现代表了吴越地域筑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以作为东瓯王都的温州城,其基本框架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以上的推测,我们还可拿两千年来在城址、形态上稳定不变的绍兴古城(图5)来跟温州城做一更具体的比较。从1892年绍兴城复原图上来看,

① 钟翀:《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史林》2014年第4期。

当时城墙、外濠完整可见,从整体上看,墙濠形成了近方形的城市轮廓。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都城,绍兴与苏州并称为历史上吴越两邦的核心之地,根据《吴越春秋》等文献的记载^①:在BC490年建城伊始,设计者范蠡就考虑到了当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的复杂微地形背景。

在城市选址上,绍兴城坐落于会稽山脉下的冲积平原,北临鉴湖,四周既有大量湖沼散布、水路被逐渐固定的泛滥低地(此种景观十分类似于今温州城南的三垟湿地,也可推测为温州古城中若干地段的原初生态条件),又有众多山脉延伸的孤丘,如种山、府山等的存在(这一地貌现象与温州古城也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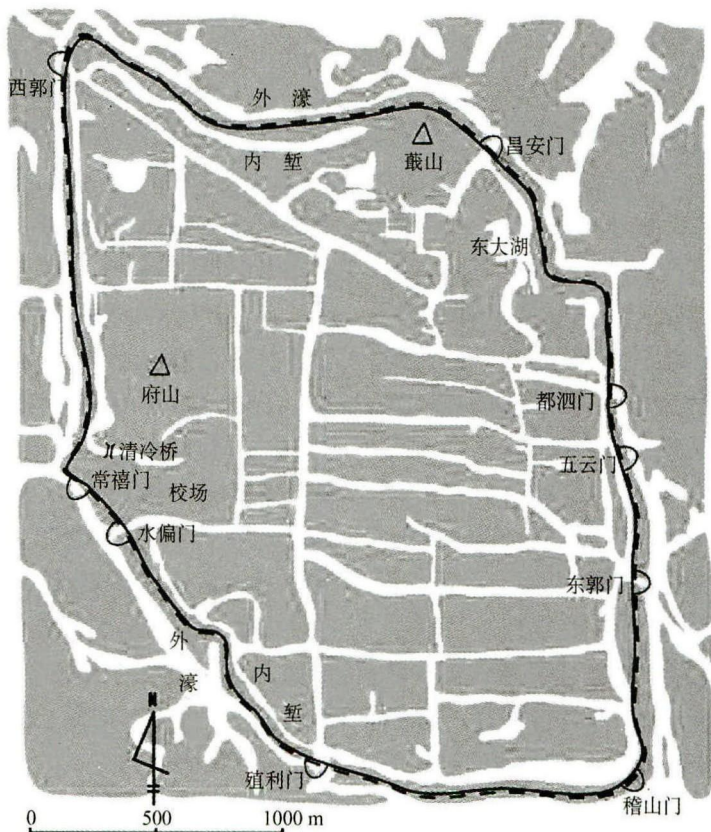


图5 绍兴古城复原图(1892年)

而在城市修筑上,一方面,绍兴城借鉴了此前伍子胥修筑苏州城的规划

① [汉]赵煜《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第八”。

方案,形成了南北方位规整、近乎圆角方形的基本城市轮廓,这与温州城总体规划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绍兴城充分利用了城墙两侧的天然水体——其东西两侧纯粹利用凤则、平水两江作为城濠,南面则在较为宽阔的湖泊之中以填埋的方式取得城基,通过对天然水体的局部埋填、局部挖掘的整饰,最终形成整体近长方形、而局部曲折多变的墙濠样式,而温州古城南、北以会昌湖和瓯江为天然护城河,东、西为利用地势人工挖掘濠堑与绍兴城的设计也极为相似。

从以上的比较来观察,温州古城的实际形态,无论在整体的选址和规划思想上,还是在局部的处理上,均与绍兴城有着惊人的一致,可以说在中国很难找出另一个具有如此相似的筑城工学与理念的古城了。考虑到吴、越与东瓯、闽越的密切关系,而绍兴、苏州等城市形态的基础奠定,发轫于越汉交替的先秦之际,我们完全应该对温州古城的历史上限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补充提一点,事实上,温州当地的早期地志也并没有否定东晋太元元年筑城之前该地古城存在这一点。南朝刘宋郑缉之《永嘉郡记·瓯水》云:“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

道,今犹在也。”弘治府志也提到汉代城濠之存在,其书卷六《坊门》云:“平市坊,汉永宁县城濠在此。有埭,通四运,至今称万岁埭。后以布货于此,故改今名。”^①。这些记录都是温州古城早期历史的遗痕,值得我们重视。

余论

本文的考察表明,东晋郭璞卜筑温州城的记载应可否定,而目前的资料虽然不能确认东瓯王都与温州古城的直接联系,但五代宋初以来温州古城郭近千年的稳定构型,显示该城的形成应当存在一个长期的发育过程。若以温州城的地理位置,即其多重山水环绕的地理形势来看,无疑应该作为东瓯王都的最理想的候选,并且,不仅在整個瓯江流域,甚至从台州至于闽北的东南沿海一线,最大的平原就数瓯江三角洲,虽然灵江、飞云江、鳌江等河口三角洲往往也会形成自成一格的独立小单元与中心聚落,但坐落于相对开阔的瓯江三角洲中心位置的温州,无疑是最有可能发达、并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心聚落。本文利用城市复原地图,对温州古城形态结构的初步分析,意在抛砖引玉,期待当地学人对该领域的先期工作投入更多关注。

① 平市坊即弘治志所云万岁埭,民国时称万岁里,详胡珠生《汉永宁县城在温州》一文考证,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Long-term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the Old Wenzhou City: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ZHONG Cho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Urban Cul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a long-term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old Wenzhou City in Southeast China. Based upon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which focus on 2 complexes of plan elements of Wenzhou City: (i) streets and their arrangement in a street-system, (ii) plots named Fang(坊) and their aggregation in the city, and examinations into the early-modern Wenzhou maps, ancient Wenzhou maps in Min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local records of city morphology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growth process of the old Wenzhou city. It further addresses issues of the early plan elements and the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the city.

Keywords: the Old Wenzhou City; Architecture History; the Ancient City Maps;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